

傅高義前言

在美國年輕的中國問題專家當中，洪源遠教授是十分傑出的一位。她在斯坦福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師從戴慕珍教授 (Jean C. Oi)。此後她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公共政策學院和密歇根大學政治學系。相較於大多數學者，洪教授在更年輕時就獲得終身教席。最近，洪教授還獲選安德魯·卡內基傑出學者 (Andrew Carnegie Fellowship for outstanding scholarship)。她主持的項目是將在中國的研究發現和經驗 (詳見本書) 應用於其他貧弱國家：尼日利亞、印度和阿富汗。

本書中，洪教授研究中國如何在幾十年間以驚人的速度擺脫貧困。1980年，中國的人均收入僅為193美元，低於孟加拉國；而到2012年，中國人均收入已達到6,091美元，增長了30倍。

這個領域的其他學者經常提出相對狹窄的問題，或者只進行定量研究。洪教授的研究非常全面，追蹤了1980年以來市場的發展軌跡，以及與市場相關的政府機構的演變，包括發展戰略和產權制度。她收集了量化信息，但也以定性的方法了解變化的背景和過程。

2006至2015年間，洪教授和她的助手們在中國詳細訪談了400多人。這些人自1980年來皆在經濟領域起了領導或執行的作用。她的大部分受訪者是縣級官員。此外，她和助手也對商人、經理、中央和省級官員以及學者進行了訪談。她親自進行了很多訪談，同時也請中國學生擔任研究助手，進行訪談，並為他們制定了非常詳細和嚴謹的培訓計劃。當她採訪時，她的一位中國助手在旁用中文詳細地做記錄。

訪談主要在12個省份進行，在福建、浙江和湖北採集到的口述資料最為詳細。洪教授在直轄市（上海和天津）也進行了採訪，在四川、江蘇和山東的訪談也較多。雖然她的受訪者職業各異，但在經濟、財稅、人事管理、公共服務等領域的受訪人比例較高。她的中文採訪筆錄多達一千多頁。

洪教授發現，在最初的發展階段，人們是運用看似落後或薄弱的制度來建立新的市場。政府成功地創造適當的環境來鼓勵人們創變，因時因地制宜解決問題，以促進市場成長。發展沒有單一固定模式，高層也沒有規劃出單一的發展模式。地方探索創新，以尋找機會促進當地市場發展。在中國，政府機構發揮着重要作用，一旦市場開始發育，官僚體制也相應地進行改革，以鼓勵市場增長並調節市場的進一步發展。但是，市場和機構的發展並不遵循單一的線性模型。市場和機構不斷相互適應。高層官員鼓勵基層人員自己尋找方法促進市場增長的同時，也為他們設下某些限制。

政府像公司一樣運作；地方領導像公司行政總裁一樣被評定業績，而基層的普通幹部則像企業職員那樣按績效獲得報酬。上級用這樣的方法為基層提供動力以繼續開發市場。

除了提出總體結論，洪教授還列舉了幾個案例：福建的一個內陸城市，浙江的一個沿海縣，以及湖北的一個內陸縣。這些例

子使她能夠對比不同的環境如何影響市場開發和制度轉變的速度。她發現，雖然市場和制度的共演通常與其某個地方一開始的條件有密切關係，但是到了發展的後期，中央政府會更主動性的推動內陸地區的發展。通過研究大量不同的地區，洪教授揭示了市場和機構共同演變的變易性。她發現早期和晚期的發展階段，並沒有同一套政策適用或簡單的直線關係。

追溯了中國市場和制度的演變軌跡，洪教授也在本書探索其他國家的過程。她發現，在其他國家，雖然環境未盡相同，但它們的市場和機構的共演過程卻與中國基層變化的順序非常相似。

傅高義 (Ezra F. Vogel)

哈佛大學亨利·福特二世社會科學榮休教授

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中文版序

這本書講的不僅僅是中國發展的故事，它講的是人類發展的故事，以中國的歷程為啟示。通過追溯中國在過去40年從社會主義轉向市場經濟的故事，我一方面提煉了經濟和制度發展的普適原則和過程，並將其總結為「引導創變」的一套體系；另一方面，這些原則的具體表現又是中國所獨有的。

通過這個視角，我認識到中國有許多獨特的環境、政治和實踐；與此同時，也從這個引人矚目的歷史得到對其他國家和組織富有教益的普遍啟迪。就提煉對世界其他地區有用的「中國智慧」或「中國方案」的要素而言，這種分析方法不可或缺。

今天，全球發展到了一個至關重要的轉折點。我們處在一個日益互聯的世界中，充滿複雜和難以預料的挑戰。主要的發展組織、領導人、智庫和重要的公共政策學院，以及發展中世界的民眾，都在熱切地尋找駕馭這個世界的新方法。西方主導的發展體制長期堅持一刀切的傳統「善治」範式，這種做法很快就失去了吸引力。取而代之的是，國際發展領域裏的專家和領導日益信奉的「適應性發展」、「變易性」和「系統思維」的相關概念。

但是，包括中國人在內的許多人，都還沒有認識到這個令人驚異的事實：改革時代的中國為「適應性發展」、「變易性」和「系統思維」提供了非同尋常的豐富例證。早在這些概念在國際發展領域流行之前，中國就已經開始實踐他們了。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引人注目地轉變了中國的經濟和社會。這不是通過自上而下的命令，而是接受了在一個變易的環境中計劃和控制的限度，並在執政黨的引導下促進學習和培育積極性。將自上而下的引導和自下而上的創變相結合，我把這種看似自相矛盾的混合體稱為「引導創變」。

雖然變易性可以稱為「二十一世紀的科學」，但是對中國古代思想而言，它的原則並不新奇。變易性可以用「易」這個字加以精確刻畫，它的象形文字是一個太陽和一個月亮，這指出了矛盾的共存可以產生無限可能和變化。



但是，不要搞錯了。雖然中國哲學有大量關於變革的變易性和靈活性概念，但是在文化或哲學上並沒有任何決定成功或失敗的內容，因為關鍵在於選擇和應用。在過去幾個世紀，中國通過自身證明，同樣的文化可以導致停滯也可以激發創新。即便是最佳的思想，也必須持續激活和實踐。本書旨在強調和總結一些關鍵思想。將它們付諸實踐是所有人的事。

2018年4月1日

序 言

本書源自我在早期曾經放棄的一本書。

xi

起初，我計劃寫作一本書，解釋為什麼中國如果不具備對於有效促進增長而言屬不可或缺的韋伯式(Weberian，專業化)官僚，卻能夠成為發展型(促進增長的)國家。表面上，這是一個好問題，或者我是這麼認為。

但是很快我就意識到這個問題是錯誤的。

首先，韋伯式官僚真的是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嗎？如果像韋伯式官僚這樣的好制度是市場成功所必不可少的，那麼這些先決條件來自哪裏？它們本身不是取決於經濟增長水平嗎？

其次，中國的確是一個發展型國家並缺少韋伯式官僚嗎？許多觀察家稱讚中國的地方政府強力和積極主動地促進增長，但是其他人卻因為相反的問題而嚴厲斥責同樣的行動者：無能和貪腐。那麼，誰對誰錯？實際上，取決於你在何地 and 何時去看中國內部，你會發現各不相同的政治經濟，從發展型到掠奪性，從韋伯式到家長制，從現代到落後。在一個變化如此快速而地區差別如此大的國家，沒有一種單一描述完全正確。

認識到這個故事的每個部分都在變動，頃刻我感到不知所措。

當一些事情保持不變時，傳統的概念和分析工具行之有效。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當比較一個富國和一個窮國時，我們尋找這兩個案例的差異。如果它們在所有方面都幾乎一樣，除了一個方面，例如治理質量，那麼我們可以推斷這個因素可能導致了經濟差異。

但是，要是原因是這個結果 (outcome) 的後果 (consequence) 時，那麼又該怎樣？清楚的是，制度和治理受到經濟發展水平的深刻影響。一個人可以應用統計技術將制度對經濟的因果效應分離出來，在統計用語中也稱為處理內生性 (treat endogeneity)。但是，這種技術不能「解決」這個事實，即兩個變量內在地相互依存。

此外，要是原因和結果都是隨着時間而變動的目標，那麼又該如何？例如，上海在1980年代是貧窮、亂哄哄和腐敗的，但是到了2010年代它就接近東亞現代發展型國家的發展水平了。是制度改變了經濟，還是恰恰相反？

xii 分析人員會通過一些假定不變的深層次原因去追溯因果性，例如地理因素或者在過去發生的衝擊，從而試圖繞開這些「問題」。但是如果像地理或歷史這樣的因素是決定現在結果的主要原因，那麼這就說明成敗天註定。如果一個國家缺少良好的地理條件或歷史遺產，它就註定會失敗嗎？一些地方有着糟糕的地理環境，或在過去曾經歷重創，但卻命運逆轉，應當作怎樣解釋？

我越是思考這些問題，就越想知道我們是否應該以及能夠以一種不同方式去研究這個世界。政治經濟發展的現實是，幾乎任何事情都在變動之中。我們能夠不去試圖控制事情保持不變而理解這個現實嗎？

因此，我拋棄了最初的探究，轉而從一個基本問題重新開始：發展實際上是如何發生的？如果我們照着現實原本的樣子去擁抱它，直接亦步亦趨地追尋變動的各個部分，我們將會學到什麼？

本書報告了我繞道進入一個不熟悉的疆域而獲得的發現，但是歸根結底這是一個更加富有成效的領域。

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